

■ 刘守刚 编著

公共经济与管理·财政学系列

# 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 ——基于财政政治学的历史重撰

*Lectures on History of Public Finance in China*



复旦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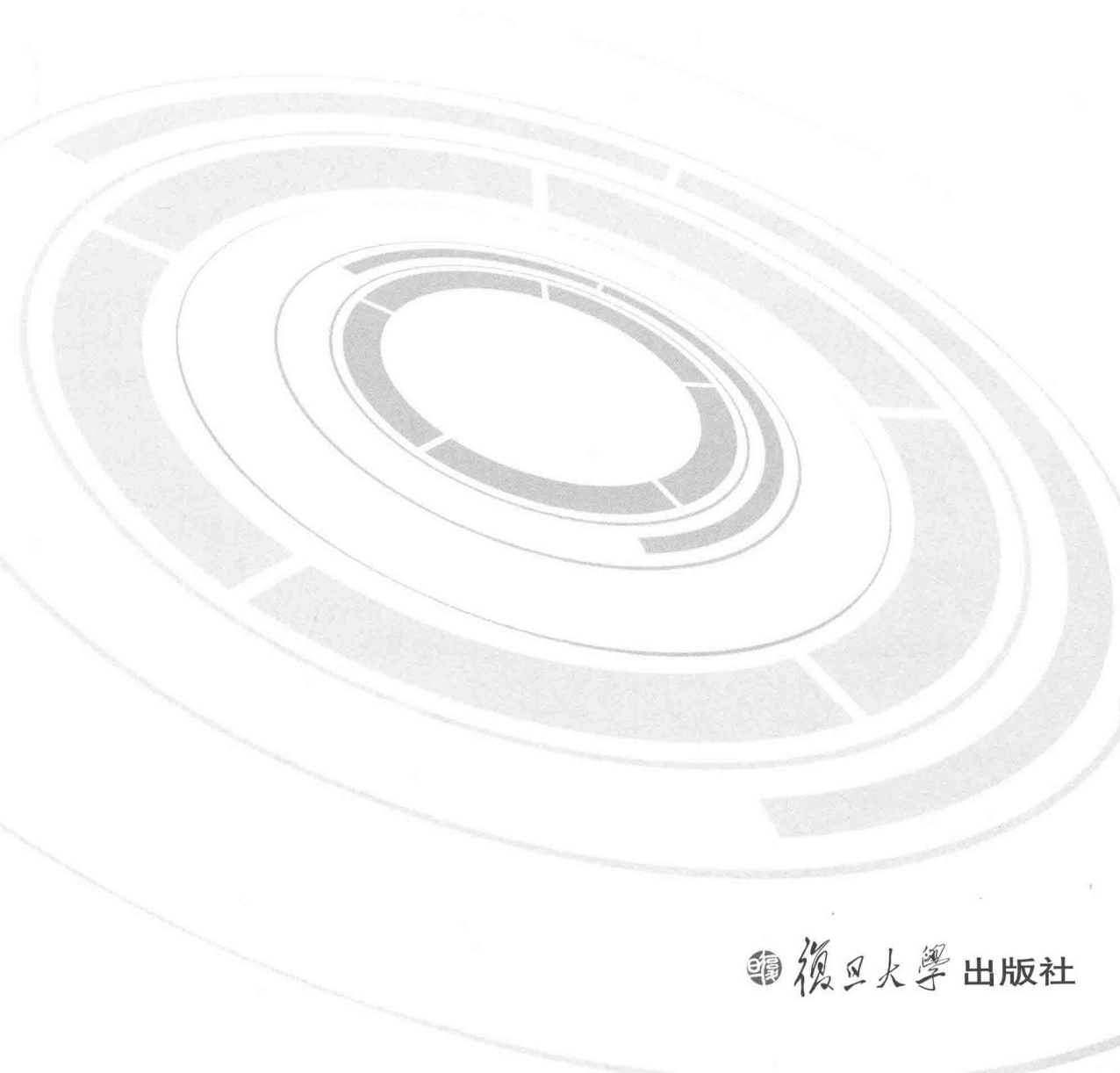
■ 刘守刚 编著

公共经济与管理·财政学系列

# 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 ——基于财政政治学的历史重撰

*Lectures on History of Public Finance in China*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财政史十六讲:基于财政政治学的历史重撰/刘守刚编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1  
(公共经济与管理·财政学系列)  
ISBN 978-7-309-12765-2

I. 中… II. 刘… III. 财政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F8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1912 号

**中国财政史十六讲:基于财政政治学的历史重撰**

刘守刚 编著  
责任编辑/方毅超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1.25 字数 454 千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765-2/F · 2340  
定价:42.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公共经济与管理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 任 刘小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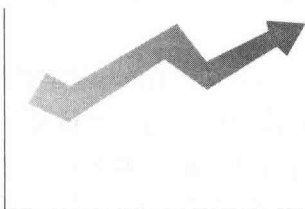
副主任 方 芳 何精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 芳 王 峰 刘小兵 朱为群

李 华 任晓辉 陈 杰 何精华

岳 崧 赵永冰 陶 勇



# 序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是一个既富有历史积淀,又充满新生活力的多科性学院。其前身财政系始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高校中第一批以财政学为专业方向的教学科研单位。经过60多年的变迁和发展,财政学科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教育部和财政部重点学科,为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在财政系基础上,整合投资系,新建公共管理系,组建了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从而形成了以公共财政、公共管理和公共投资三个方向为基本结构,以公共事务为纽带,以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公共管理人才为使命,以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学研究为核心的跨学科教学和研究机构。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具有海纳百川的悠久文化渊源。半个多世纪以来,创立和推动学科发展的知名教授中既有毕业于美国、日本和法国等著名国际高等学府、具有极高学术声望的海外归国学者,如杨阴溥、冯定璋、曹立赢、席克正、周伯康、尹文敬教授等;也有长期致力于中国财政经济、投资经济研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著名教授,如苏挺、李儒训、葛维熹、俞文青教授等。他们曾引领了我国财政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学科人才的培养基础,也为上海财经大学在公共经济领域开拓了一片沃土,培育了一批财政、投资和税收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经济体制改革掀起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也给学院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目前学院已经发展成为由财政、投资、税收、公共管理、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五个系组成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10个本科专业、15个硕士专业和7个博士专业授予点,同时建立了以9个研究所中心/所为基础的科研团队。2012年年末,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诞生;2013年,作为上海市教委建立的十个智库之一的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成立,从而构成了以学院为主体,以两个研究院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教学科研组织结构,成

为以公共经济和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以提供政府公共政策咨询为己任的开放型、跨学科协同创新研究平台,开启了学院融教学管理、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为一体,协同发展的新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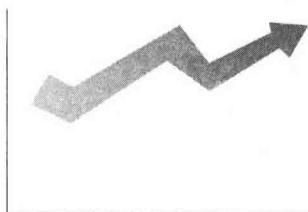
传承历史,继往开来,学科建设是学院整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院的龙头工作。而课程建设既是学科建设的中心环节,又是承载专业教学重任的关键桥梁。抓好课程建设不仅是深化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学科自身建设的根本大计。为了深化学院课程体系改革,推动将优质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落实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制度,帮助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学院在课程建设上,明确了名师领衔、团队攻关,“以系列教材建设为品牌,以精品教材建设为目标,以实验性和务实性教材建设为特色”的教改思路。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公共经济与管理系列丛书”旨在推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课程建设的成果。这套丛书既是学院全体教师劳作的园地,又是学院教学展示的窗口。

在公共经济与管理系列丛书出版之际,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刘小兵

2014年9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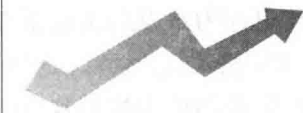
# 目 录

第一讲 导论 .....	1
第二讲 概念与理论 .....	10
第一节 国家、国家类型与国家转型 .....	10
第二节 财政、财政类型与财政转型 .....	16
第三节 财政与国家成长的一般理论 .....	23
第三讲 从城邦到帝国进程中的财政国家 .....	27
第一节 城邦时代的国家与财政 .....	27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转型与新财政类型的诞生 .....	33
第三节 转向帝国：以商鞅变法为例 .....	42
第四节 家财帝国制度的原点 .....	52
第四讲 家财型财政在第一帝国的成形 .....	56
第一节 第一帝国财政形成的制度环境 .....	57
第二节 第一帝国对家财型财政的重构 .....	64
第三节 汉武帝对第一帝国财政制度的完成 .....	69
第五讲 帝国初兴时期财政理论的反思 .....	74
第一节 《盐铁论》这本书 .....	75
第二节 财政支出规模是大好还是小好？ .....	79
第三节 工商业是否可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 .....	81

第四节	如何管理暴利性资源商品？	83
第五节	《盐铁论》中其他重要财政问题	85
第六讲	第一帝国的衰亡与财政救治	91
第一节	第一帝国的制度病变与豪强的兴起	91
第二节	挽救帝国的财政努力与帝国崩溃后的财政遗产	97
第三节	帝国崩溃后的财政探索	103
第七讲	“税地”财政在第二帝国的实现	114
第一节	新帝国的财政基础	114
第二节	两税法改革与第二帝国财政制度的初步成型	121
第三节	唐宋间财政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128
第八讲	国家生存竞争下第二帝国的财政创新与失败	133
第一节	宋帝国财政运行的总体环境	134
第二节	宋代财政的特色	139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对帝国财政边界的挑战	144
第四节	财政视野下第二帝国的衰亡	150
第九讲	帝国成长时期财政思想的争论	156
第一节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财政收支方面的理论争论	157
第二节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财政分配方面的思想分歧	162
第三节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财政管理方面的不同看法	169
第四节	财政治国方式的选择与思想传统	176
第十讲	第三帝国成熟而低弹性的财政收入体系	178
第一节	第三帝国财政的制度环境	178
第二节	帝国正式财政收入体系的重建	182
第三节	役归于地与帝国正式财政收入体系的完成	188
第四节	非正式财政收入体系与帝国财政收入的弹性	192
第五节	第三帝国的财政收入体系与内在紧张	196
第十一讲	第三帝国消极主义职能观支配下的财政支出体系	200
第一节	量入为出：第三帝国财政支出的总原则	201
第二节	日趋成熟帝国中的军事支出	203
第三节	再分配特征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支出	205
第四节	日形桎梏的皇室费用与官俸支出	210



第五节	僵化的支出安排与潜在的危机·····	213
第十二讲	第三帝国不断集权却难以理性化的财政管理体系·····	216
第一节	作为财政管理工具的货币之发展·····	216
第二节	财政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	220
第三节	财政对目的性国家的管理·····	225
第四节	雍正帝财政管理改革及其限度·····	233
第五节	难以理性化的财政管理与帝国财政转型的动因·····	237
第十三讲	晚清财政转型与工具性国家变革·····	241
第一节	财政大危机与帝国财政的终结·····	241
第二节	家财帝国向现代转型的思想探索·····	251
第三节	晚清工具性国家的变革：以度支部为例·····	259
第十四讲	目的性国家的变化与财政转型在民国时期的失败·····	266
第一节	利益原则的合法化·····	266
第二节	重商主义的兴起·····	270
第三节	民国时期财政转型的继续与最终失败·····	274
第十五讲	新中国现代财政构建与国家转型的进展·····	283
第一节	财政重构的总体环境与思想渊源·····	284
第二节	现代家财型财政的兴衰·····	288
第三节	税收型财政的再建与现代财政的基本成型·····	294
第十六讲	中国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	302
第一节	“双轨”的帝国家财型财政·····	302
第二节	帝国成长的财政基因·····	309
第三节	通向现代国家的财政道路·····	313
第四节	中国政治发展的财政动因·····	321
参考文献	·····	327



什么是重撰？1986年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发表“重撰现代性”演讲时说，所谓的“重撰”主要有两层意思：① 回归到起点；② 进行深加工。在当前，中国财政史教材已经堆积如山，为什么还要增加一本基于财政政治学视角、以重撰为宗旨的教材？

### □ 一、财政史的尴尬，尴尬的财政史

在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悠久、历史感厚重的国家，财政学专业设置“中国财政史”课程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正因如此，财经大学（学院）在财政学专业中，基本都开设了“中国财政史”这一门课。财税专业的学生被安排修习“中国财政史”，似乎也没什么疑问。可是，“熟知非真知”，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不言而喻”，却消解不了“中国财政史”课程所面对的尴尬。细究下来，这种尴尬既表现为财政史的尴尬，又表现为尴尬的财政史。

所谓财政史的尴尬，是指目前的财政史课程“学生不爱学，教师不愿教”<sup>①</sup>。学生不愿意学，一方面是因为正在使用的传统财政史教材，“按照传统的以朝代为主讲线索的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均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sup>②</sup>，很多教材因史料堆积、观点陈旧而“缺乏生气”<sup>③</sup>；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当前功利主义潮流所及下，财政史因“学习的艰苦性，就业市场的压力”<sup>④</sup>，学生学习的动力也缺乏。教师不太愿意教，是因为财政史自身“略显

① 马金华、许敏主编：《财政史研究》（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② 同上书，第28页。

③ 同上书，第111页。

④ 同上书，第93页。

枯燥”<sup>①</sup>，研究辛苦，发表又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学科地位又低，“在高等院校财经学院的学科建设中财政史多被列为殿军旁支，这就使得从事财政史教学和科研的教师或者英雄气短，心思旁骛”<sup>②</sup>。财政史在研究上地位低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今天财政学专业课程大多已被主流经济学方法“一统天下”之际，财政史因为难以运用数学方法来处理浩瀚的材料，所以显得像个异类，与财政学其他课程有点格格不入。

所谓尴尬的财政史，是因为目前财政史的研究在学术领域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财政史学界的前辈陈明光先生曾经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是财政学的财政史，还是历史学的财政史”？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此处所谓的尴尬。陈明光先生的意思是，目前财政史研究有两类不同的主体，“有两支学养各有长短的财政史教学与科研队伍。一支是分布在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以历史研究为专业的学者，他们有比较系统深入的历史知识，通常专攻某一断代史，熟谙文献和专业史料，擅长考据，但一般缺乏现代财政学的理论素养和问题意识。一支是财政学界主要是财经院校的教师，他们中不少人的学养从本科到研究生都是学习财政学或经济学的，没有受过历史学的系统训练，长于掌握现代财政学的基础理论，但缺乏广博的中国通史和断代史知识，史料的掌握尚欠全面深入，史实考据功力不深”<sup>③</sup>。这样两类主体在研究方法、教学对象和学科际遇等方面都有鲜明的区分，陈明光先生给予的建议是：两类学者应该相互借鉴，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上运用现代财政学理论或概念进行研究，实现有机的结合。

陈明光先生的上述建议当然是对的，可这一说法仍然消解不了财政史研究者所面临的下述尴尬，那就是：他们的研究既达不到历史学所要求的史料程度又做不到理论研究要求的深度。特别是对财经院校现有的财政史研究者而言，要求他们关注历史学家发掘出来的历史性文献是合理的，但由于很多人并没有接受过历史学的训练，因此很难用历史学的标准（如史料的原创性与考据的严格性）来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而要求他们运用现代财政学理论或概念也是对的，但在选择运用什么理论或概念时却出现了问题，因为财政学自身的学科定位就存在问题。

在我国学科体系中，财政学从属于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如果强调在财政史研究中运用理论与概念，那就势必意味着必须运用经济学理论与通用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来评价财政史研究成果。但是，强调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财政史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似乎是最不重视历史的学科；或者运用英国学者霍奇逊的说法，以前曾经高度重视历史的经济学，现在已经“忘掉了历史”，现代经济学“通用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上：‘一个理论就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对于历史差异和区域差异并不足够敏感”，“由于摒弃了以前的历史研究倾向，经济学在整体上变形了。它不再将重点放在对于真实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对于‘个体选择’进行演绎主义的探讨”<sup>④</sup>。更为严重的是，要运用源于西方经验的经济学理论

① 马金华、许敏主编：《财政史研究》（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 页。

② 同上书，第 61 页。

③ 同上书，第 60 页。

④ 霍奇逊著：《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序言。

来研究中国财政历史,虽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不能不说确实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这也是当前出版的中国财政史教材,大多缺乏经济理论分析而局限于资料堆积的部分原因所在。不是说学界没有出现过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财政史料的研究,但在当前经济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数学化、量化分析的前提下,这样的研究,即运用数学或定量方法来研究数据残缺的财政史料,在很多时候不得不沦为“猜测史学”。一定程度上关注数学或定量方法的“猜测史学”并非不可以,但若强行要求只能这样做的话,就会将财政史上众多制度性、思想性的史料排斥于研究范围之外,其后果难免会让人产生“买椟还珠”之荒谬感,因为制度性、思想性史料才应该是财政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概而言之,财政史确实不能停留于史料而需要运用理论,可经济学并不能为财政史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为此,需要另外寻找财政史教学和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二、“中国财政史”重撰：财政政治学的视角

无论是要化解财政史的尴尬还是解决尴尬的财政史这样的问题,都要求在研究财政史以及编写财政史教材时,进行一定程度的再造。这种再造就是导论开头所说的“重撰”,包括“回归到起点”与“深加工”两层含义。本教材的目的,就是尝试着“重撰”中国财政史,为现有的中国财政史教材增添一种新的写法。

就中国财政史而言,所谓“回归到起点”,主要是指让财政学回归到政治学学科中去。众所周知的是,财政活动并非单纯的经济活动,它不但具有经济属性,同时还有政治属性。在研究财政活动的经济属性时,经济学方法当然适用;但就财政活动的政治属性进行研究时,单纯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就显得捉襟见肘。在曾经塑造现代财政学的经典作家那里,有一种相同或相似的看法,那就是财政学是属于政治学的或至少是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如英国财政学者道尔顿在1922年就明确提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种科学<sup>①</sup>。德国古典财政学大家瓦格纳的看法是,财政是独立于私人经济的活动,与其说是属于一般的经济理论,不如说是属于政治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即财政学应该是属于政治学的<sup>②</sup>。意大利经济学家科萨曾云,“财政科学是公共管理学的组成部分,因此也是政治科学的分支”<sup>③</sup>。的确,财政是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在中国历史上有极为丰富的财政政治实践经验,因此中国财政史研究与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教给学生历史上有关财政治国的相关智慧。正如南宋时的学者叶适所言,“财用,今日之大事,必尽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知今故也”(《叶适集》卷4)。显然,若将财政学限定在经济学学科范围内,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

就中国财政史而言,所谓“进行深加工”,主要是指运用理论(特别是政治学理论)框架来概括和解释极其丰富的中国财政史料,就是像赵云旗先生说的,“把财政史教学的重点

① 朱柏铭:“中国财政学的革命”,《经济学家》2000年第2期。

② 张馨、杨志勇、郝联峰、袁东著:《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③ 雷艳红:“公共财政教育的政治学导向:必要性与目标”,《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2期。

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转移到解释财政学发展的规律上来”<sup>①</sup>。中国财政史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可能是,运用理论尤其是政治学理论来解释财政史料,概括中国财政发展规律和治国理财的政治智慧。以此为指引,中国财政史的写作就要改变过去许多教材存在的史料堆砌和叙述框架陈旧写法,要像葛兆光在阐明《中国思想史》写法时说的那样,“改变过去的传统写法和充满训导性的教科书式的章节结构”<sup>②</sup>。这样说来,中国财政史的撰写,应该探索以阐释(即“深加工”)为主的新写法,在进行阐释时运用的理论又以政治学理论为主。

这样的一种重撰活动,也许可以化解前述的“财政史的尴尬”的问题。要看到,当前对财政史,学生不爱学、教师不爱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历史不感兴趣。事实上,近些年来历史类读物,无论在大学内还是在社会中都是畅销读物。之所以出现不感兴趣的尴尬现象,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当前财政史教材大多数只是史料的堆积而缺乏理论的分析。因此,我们应该首先像黄仁宇先生提倡的“大历史”那样,不再堆砌财政收支与管理的历史资料,而是“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框架”<sup>③</sup>,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其与理论逻辑、与他国历史经验进行对照,最后提出治国理财的规律与历史智慧。这样的课程,将有助于人们洞察历史和把握规律,有可能会引起学生和教师的兴趣。

这样一种重撰活动,也可能会消除前述“尴尬的财政史”的问题。就是说,在陈明光先生所提及的两类财政史研究者中进行分工:以历史研究为专业的财政史学者,分工的侧重点在于进一步搞清财政史的历史事实;而财经院校的财政史学者,分工的侧重点在于运用理论分析财政史料、把握历史规律。当然,这样说并非排斥历史学者对财政史进行理论解释,也不排斥财政院校学者去挖掘财政史料,只是强调二者的分工侧重点不同,并因这种分工而形成合作。当然,不得不再次强调说,虽然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已经忘掉了历史,但财政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财政史学者在解释财政史料时所运用的理论,不能不说主要是政治学的。或者说,这样的研究主要是运用财政政治学来解释财政史。还需要交代的是,这样的财政史研究应该牢记陈明光先生的警告,“运用或借鉴现代财政学理论或概念,须努力地与史实有机结合,不能穿鞋戴帽,或理论与史实为两层皮;不能削史实之足,去适理论之履,更不能张冠李戴”<sup>④</sup>。不过,话又说回来,财政史研究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可能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让史实服从理论,或者说一定程度的“理论先行”也许难以完全避免。用何兆武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学家的理论并不是从史料或史实之中推导出来的,反倒是历史学家事先所强加于史实之上的前提;也可以说,历史学家乃是人文(历史)世界真正的立法者”<sup>⑤</sup>。

这里需要给财政政治学作一个简单的界定。所谓财政政治学,就是研究财政活动中的政治问题的学科,或者说用政治的眼光来考察财政活动的学科。所谓政治的眼光,涉及

① 马金华、许敏主编:《财政史研究》(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②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中文版自序。

④ 马金华、许敏主编:《财政史研究》(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⑤ 何兆武著:《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自序。

对政治的理解。在学术界,对此意见并不统一,也不可能统一。不过总体而言,将政治活动理解为权力活动、视政治过程为权力的配置与实现过程是一种比较通行的见解。因此,本教材将政治的眼光理解为权力的眼光,从权力的来源(是否具有合法性?)、权力的目标(是否符合公共性?)、权力的静态配置(是否实现规范性?)、权力的动态运行(是否达到有效性?)等多方面来理解政治活动。这样,财政政治学的内容,就是从财政的收支与管理活动过程中,考察财政的权力来源、权力目标、权力配置与权力运行等多个方面,这些涉及到财政权力的合法性、公共性、规范性与有效性等多个方面。

总之,要化解财政史的尴尬或者尴尬的财政史等问题,一种做法是从财政政治学的视角来重撰中国财政史。这样的重撰,需要在高度概括财政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分析,要有能对数千年中国财政史发展提供新的具有洞见性的框架,要能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财政治国的智慧。

### □ 三、本教材的旨趣与叙事主角

如前所述,“中国财政史”虽然作为财税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而在财经院校中广泛存在,但其教学活动与教科书编写大多处于比较尴尬的状态:一方面,由于许多教材和教学活动仍将自己陷于史料的堆砌中,缺乏理论与分析,因而使该课程显得琐碎而无趣;另一方面,由于财政史常常将自己局限为经济学学科,而经济学又持有一种非历史的方法论,从而既让财政史的研究缺失了理论指引又丧失了其应有的指引财政实践的智慧。

#### (一) 本教材的旨趣

著名学者熊彼特曾经这样强调财政史的重要性,“财政史是一个民族整体历史中最基本的部分……财政史使人们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发展的推进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实在的条件(特别是组织的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sup>①</sup>。本教材基于财政政治学来叙述中国财政思想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回应熊彼特赋予财政史的使命,即“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具体而言,本教材试图从财政政治学视角回答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① 维持中华国家长期发展的财政机制是什么?② 主导传统中国财政成长及向现代转型的内在机理是什么?③ 从财政上看,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有什么独特性?④ 中国政治发展的财政动因是什么?

大体上,财政史研究可能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蚂蚁型,就是说在研究时像蚂蚁储存粮食那样,不去改造材料的性状,而是运用比较简单的框架来堆积与安置各种材料。第二类为蜜蜂型,就是说在研究时像蜜蜂将花粉加工为蜂蜜一样,对材料加以一定的加工并形成新的东西,但新东西与旧材料之间的关系仍清晰可见。第三类为蜘蛛型,即在研究时像蜘蛛吐丝一样,以创造全新的东西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新东西肯定来自于旧材料,但旧材料早已被消化干净,从新东西中甚至看不出旧材料的痕迹。

<sup>①</sup> Joseph Schumpeter, *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in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edited by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以这三种类型来衡量,本教材的旨趣属于第二类,就是说努力运用政治学理论框架来整理中国财政史的材料,以此为基础获得对中国财政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尝试着回答上述四个问题。因此,本教材的写作方式可能有别于目前的许多《中国财政史》教材,主要内容不再是简单的时空框架内的史料堆积(即第一类财政史研究),而是从较新的视角(即政治视角)出发,用理论来阐释财政史料,揭示财政发展规律与财政治国的智慧。在写作上,本教材在处理理论与史料的关系时所秉承的原则是:在尊重史料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让史料服从理论。

除此之外,本教材在展开过程中,还试图坚持以下两个立场。

(1) 从一国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材料出发,而不是从想象和抽象逻辑出发进行研究。就是说,从历史过程本身来总结其中蕴含的意义,以概括和提炼相关理论。强调这样一种立场,是试图区别于主流经济学从抽象原则出发进行的研究。从抽象前提出发,经过演绎来获得整个理论体系的立场,也许适用于主流经济学,但财政研究肯定不能局限于此。因为财政制度和财政思想,是现实历史演变的结果,其丰富性不是仅从抽象前提进行演绎就能完全把握得了的。

(2) 坚持中国中心观立场,从中国自身的逻辑出发进行研究,从“中国”看中国。就是说,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变迁和逻辑过程来组织材料、提炼概念、构建理论,将当前中国的现实看成本民族机体自然成长的结果。这一立场,在史学界被称为“中国中心观”或者“中国中心取向”。中国中心观,区别于以西方为出发点研究中国的学术立场,它着力于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sup>①</sup>。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仍有不少学者习惯于用源于西方的概念(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和理论,来宰割活生生的中国现实,而未能做到从中国自身逻辑出发,运用与构建适合于中国现实的概念和理论。

## (二) 叙事主角

传统中国财政史的叙事主角大多是王朝,它讲述每一个王朝的财政状况(收入、支出与管理情况)。这样的框架在安排相关史料时比较方便,也有利于读者按字典方式查找相关的内容。但该方式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在形式上显得呆板僵硬,在内容安排上也容易失衡或重复,因为不是所有的王朝在财政史上都同等重要(如秦、隋等王朝过于短暂),也不是所有的王朝在制度建设方面都有值得书写的新意(如东汉相对于西汉,清相对于明,都了无新意)。更为重要的是,以王朝为叙事主角,似乎看不出鲜活的、有机的财政制度成长与思想演进,而只看到可叹的王朝循环与博古架上似乎僵死的文物。

本教材的叙事主角是帝国,这是第二讲将讨论的一种国家类型。在中国这一地理空间上存在的帝国,本教材将其称为中华帝国。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华帝国是帝国这一国家类型中发展得最为成熟的代表,它帮助了身处其中的人群克服种种的生存危机,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文明。

当然,中华帝国是一个总的名称,在历史上它以不同王朝的面貌出现,也经历了不同

<sup>①</sup> 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译者序。

的发展阶段。本教材按照其内部发展轨迹,把中华帝国比较典型的阶段(统治期较长、统治比较稳固的王朝),依照制度发展阶段上的重大差异,划分为第一帝国(西汉与东汉王朝)、第二帝国(唐宋王朝)和第三帝国(明清王朝)。这一分法参考了黄仁宇先生的说法,不过也有所不同,因为他区分的三个帝国分别是,第一帝国包括秦汉王朝,第二帝国包括隋唐宋王朝,第三帝国包括明清王朝<sup>①</sup>,而且他没有指出如此区分的标准何在。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教材所区分的三个帝国中,君相关系、指导思想、人才选拔机制、财政制度等四个方面存在着足以区分彼此的差异。还需要指出的是,三个帝国的划分,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华帝国从初生到成长再到成熟这样有机生长的三个阶段。

具体可参见表 1.1 的内容。

表 1.1 中华帝国的三个阶段

	第一帝国(帝国初生期)	第二帝国(帝国成长期)	第三帝国(帝国成熟期)
君相关系	皇权、相权相对分开,宰相为政府领袖,皇权不断设法控制相权	相权一分为三(尚书、中书、门下),群相代替独相,政府制度较健全	宰相职位被废,皇帝兼政府首脑,内阁(清中后期为军机处)辅助皇权运行
指导思想	引儒家学说柔化法家制度,司法上引经决狱,儒学中的今古文经学黄金期	在立法层次上高度融合礼法,理学经由韩愈到朱熹的努力而发展	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标准意识形态
人才选拔机制	中央太学培养,地方郡国察举后由中央考试选拔,官员私人征辟盛行	开创科举作为官员初仕的途径,制度不断调整,诸科最终合一,内容最后限于经义	科举制度日趋严密,考试内容固定在四书五经,文体格式也定型为八股
财政制度	田赋虽为正项,但管理上“舍地而税人”,财政收入主要是人头税,力役繁重	向“履亩而税”过渡,两税成为正统收入,来自工商业的收入比较重要,力役处于制度化消灭过程中	确立“履亩而税”的田赋为正宗财政收入,来自工商业的收入在制度上不重要,力役则在制度上逐渐消失

#### □ 四、《中国财政史》的“开头”与本教材的结构安排

对一本财政史教材而言,从哪里“开头”以及怎样安排结构自然很重要。本教材基于前述设定的写作目的与旨趣,将根据以下方式来开头并编排篇章结构。

##### (一) 中国财政史如何“开头”

就国家类型(第二讲将讨论)来说,从全球比较的眼光看,古代中国在城邦国家的发展上并不充分,而在帝国国家的发展方面具有丰富性与典型性。因此,本教材把叙述重点落在帝国这一国家类型所对应的前后历史时期,其时间节点大致上是从西周王朝开始,直到晚清、民国乃至当代结束。

也就是说,本教材基本上略去了传统《中国财政史》教材对夏、商两个王朝甚至夏之前

<sup>①</sup> 黄仁宇著:《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52 页。



财政的讨论。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夏、商王朝特别是夏之前的财政史料过于缺乏,尤其夏王朝的存在至今仍无非常确切的考古学证据;二是因为后世帝国在财政原则上基本源于周王朝奠定的基础,而与夏、商王朝关系不大。下面分述之。

传统的《中国财政史》教材,有许多从讨论国家诞生之前的原始财政开始,接下来再讨论一下夏、商两代王朝的财政状况,以此作为财政史的“开头”。本教材限于写作的目的(基于财政政治学来“重撰”财政史)与史料的原因,不打算探讨国家诞生之前的财政问题。财政史特别是中国史的教科书,常以元谋人或北京人作为中国人种起源的证据,以说明中国人历史的悠久性并据此臆测原始社会的状况。但众所周知的是,今天考古学与基因学的证据基本表明,全世界人类可能只有一个起源,那就是东非的某个地方,然后人类才扩散到全世界。对原始社会进行臆测当然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但毕竟不足为凭。就国家的诞生而言,在中国这一地理空间中,最早的国家形成于何时何地,迄今为止并无确切的历史证据。特别是古史传说中所谓的“五帝”(即夏王朝诞生前的五位帝王)时期,是否可以算作国家,学者们的意见不一。即使是被无数先秦典籍记载过的夏王朝,虽然已有少量的考古依据,但迄今仍未得到特别可靠的考古支持。特别地,在商代甲骨文卜辞中几乎未见到有关夏的确切文字记录。商王朝的存在自然毫无疑问,但有关商王朝财政国家的情况,史料也不丰富。

众所周知的是,后世中华帝国的制度经验和心理基础,来自于西周初年按宗法原则所建构起来的“家天下”制度而非商代的政治制度。比如说,商代并未确立起嫡长继承制,周国及周王朝才真正确立嫡长继承制,“只有到嫡长子继承制及宗法制确立以后,‘家天下’的国家制度才进一步完善了”<sup>①</sup>。换言之,周王朝的制度,虽然可能借鉴了一点商的制度经验(及教训),但其制度主体具有独立的来源,并在周商革命之际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才形成了影响后世的家天下国家制度。正如王国维先生强调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sup>②</sup>。比如说,在意识形态方面,周王朝以“德”为核心(不同于商代以鬼神为核心),这是后世中华帝国制度的价值基础。基于以上原因,本教材从周代开始叙述中国财政史,并将周王朝作为“开头”。

## (二) 结构安排

除了“开头”外,本教材在结构安排上与传统《中国财政史》教材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不再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的传统说法作为大的分期标准,也不再用王朝作为叙述史料的章节标准。如前所述,本教材在编排时,将以帝国为叙事主角,将中华帝国的酝酿、初生、成长、成熟与转型等作为时间线索,并在这样的线索下概述中国财政史的发展进程,集中于考察帝国财政中产权制度、收入来源、支出责任与管理方式的建构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以便最终揭示财政变迁与国家成长之间的关系。

以帝国为叙事主角,在结构上自然形成了帝国形成前(即商周城邦时代)、帝国运行期(包括从秦至清各王朝,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个帝国阶段)、帝国向现代转型期(晚清

<sup>①</sup> 沈长云、张渭莲著:《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页。

<sup>②</sup>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于《王国维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